

Toward a Materialist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Mikkel Flohr

Roskilde University, Denmark

Translated by ZHAO Jingjing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ina

Received: January 8,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8, 2026

Published: March 31,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Mikkel Flohr. (2026). Toward a Materialist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ZHAO Jingjing (tran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 060–06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7.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1.007>. p

This article is a phased achievement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projects: 1) 2025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unan Poetry Classics from Digital Perspectives” (Grant No. 25C04522025); 2) 2025 Changd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Guidance Project (Grant No. 2025ZD131); and 3) Hunan Province Education Science “14th Five-Year Plan” 2025 Project (Grant No. XJK25CGD037).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arx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grounded i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begins by systematically explicating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methodological value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research. It then examin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is theory withi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s, critically analyzing Quentin Skinner’s paradigm and Ellen Meiksins Wood’s alternative Marxist framework. The study reveals that Marx’s conceptual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fers crucial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solving tensions in the field. Ultimately, by integrating Marx’s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Wood’s sociohistorical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and empirically validating this approach through case studies—the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methodological paradigm for Marxist intellectual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m; Political Theory; Social History

Source: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25, 37(1), 114–132.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Zhao Jingjing is a Lecturer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primarily focusing o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more academic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her via the email: melody121410@163.com.

唯物主義思想史的演進： 歷史、矛盾與可能性

米克爾·弗洛爾/文

羅斯基勒大學,丹麥

趙敬敬/譯

湖南文理學院

摘要:本文旨在構建基於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新路徑。首先系統闡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核及其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價值,繼而考察該理論在學科發展中的邊緣化進程,重點分析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批判性研究範式和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構建的替代性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框架。研究發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體系為化解研究矛盾提供了關鍵理論資源。最終,本文希望通過融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框架與伍德政治理論社會史方法,結合具體案例實證該路徑的實踐可行性,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提供方法論新範式。

關鍵詞:思想史;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社會史

來源:本文原載於《反思馬克思主義》(*Rethinking Marxism*),2025年第37卷第1期,第114-132頁,因篇幅要求譯文略有刪減。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5年度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數字視域下湖湘詩歌典籍英譯對比研究》,(25C04522025);2025年度常德市科技創新指導性計畫項目(2025ZD131);湖南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2025年度課題(XJK25CGD037)的階段成果。

一、引言

本文探討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思想史研究領域的發展路徑及其價值。馬克思將思想視為特定社會中核心社會物質關係的表達載體與有效組成部分,同時揭示了其內在矛盾。因此,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理論應被視為理解思想與其歷史語境關聯的重要起點,這恰恰構成了近五十年來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命題。然而,該學科領域內尚未形成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傳統,或許是因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似乎否定了思想的現實意義。但在馬克思看來,思想既是特定社會核心的社會物質條件的反映,也是其有機組成部分——從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到價值形式這類現實的抽象物皆是如此,思想同樣也反映並構成這些條件內在的矛盾^[1]。

首先,系統闡釋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內核及其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價值,然後,深入剖析該理論在學科發展中被邊緣化的兩大核心內容:一是對思想能動性的表面化忽視,二是昆廷·斯金納提出的批判範式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方法的系統性否定。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艾倫·梅克辛斯·伍德提出的

[1] 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頁58。

『政治理論社會史』,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建構實踐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但值得注意的是,該理論始終未能真正錨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理論根基。

伍德通過將政治思想與具體歷史語境機械割裂,實質上削弱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應有的理論深度,這種處理方式將馬克思思想的關聯性簡單化約為原始歷史背景的直接映射。本文通過將伍德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與其理論淵源進行深度對照,我們能夠識別並克服其方法論體系中的系列內在矛盾。基於此,本文將重構並發展一種新型唯物主義思想史研究路徑,並在後續章節中系統闡述其理論框架與實踐範例。

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最初接受的是哲學訓練,他反對哲學界認為哲學史是精神在世界歷史中通過自我實現而不斷進步的歷程的觀點,這一觀點源自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為此,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起點正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鮮明批判。黑格爾的哲學主張通過精神在世界歷史中的自我實現,來克服思想與存在的對立。^[1] 然而,在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中,物質始終從屬於精神。馬克思認為,黑格爾哲學因將觀念置於社會物質現實之上,實則是『頭足倒置』的,因此必須『重新顛倒過來』——而這一主張後來成為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原則』。^[2] 黑格爾強調觀念對社會的首要性和決定性影響,而馬克思則強調支配人們生存方式的歷史社會關係必然塑造其生活體驗與思維,以及法律、政治、哲學和宗教觀念與制度。然而,馬克思的基本觀點與黑格爾相反,認為觀念既不能自我生成,也不能獨立決定社會的組織形式。相反,觀念是由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關係和條件所塑造的,這些條件支配著人類存在的再生產。思想形成反映主導社會政治條件,且成為這些條件及其持續再生產的重要部分。正如馬克思所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而這種對思想的物質性重新闡釋,正是黑格爾從理論上揚棄主體與實體二元對立所留下的倒置性遺產。^[3]

社會與物質關係中思想的綜合決定性與有效性主要通過兩種方式體現。首先,統治階級通過積極的思想生產與傳播活動,將思想、文化等要素加以構建,這些活動以不同方式反映並合法化其統治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中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4] 他們還指出,通常只有統治階級成員才具備時間和資源來發展傳播思想,而這些思想往往在無意間折射出其生產條件。並無跡象表明這是有意為之或刻意為之:『這些主導思想不過是理想化的表達主導的物質關係,作為觀念把握的主導的物質關係』。統治階級成員所主導的思想,本質上是對既得社會關係的自發性認同,這些關係被他們視為自然、必要或公正。盡管在危機時期,這類思想也可能被有意識地維護和宣揚。

其次,觀念的社會決定性與有效性體現在全民日常生活中對核心概念的持續使用與依賴上,例如財產權和交換價值。這些觀念在社會關係的組織與再生產中占據核心地位且廣泛存在,通過社會各階層的持續實踐,它們獲得了客觀的『真實』社會與物質存在。這種存在獨立於個人是否認同這些觀念而持續存在。無論個人是否認同財產權,社會都圍繞其構建,且國家還為其提供了法律保障。價值形式和貨幣同樣如此,它們在每個人再現其存在能力的過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強調了這類抽象的實

[1] Hegel, G. W. F., Trans. A. V. Miller. (1977).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111。

[3] 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9。

[4] 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頁46。

際存在和效力,他指出:『那些把價值的獨立化看作單純抽象的人,忘記了產業資本的運動正是這種抽象在現實中的表現。[1]』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思想活動僅限於被動地反映、複製或合法化主導的社會關係,而是說思想必然以某種方式被這些社會關係所塑造並內化。因此,我們必須正視並應對這些關係,以免被其牽著鼻子走或受其左右。以馬克思的著作為例,他正是通過批判性分析和革命性鼓動,直指那些塑造他的社會關係本身。當然,實踐始終是根本。思想雖能為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踐鬥爭提供助力,但單憑思想本身並不足夠。這一立場最經典的表述見於 1844 年出版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Philosophy of Right in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馬克思在該文中的一處筆者已引述過的段落中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2]』由此可見,社會關係與物質關係始終凌駕於思想之上,但思想本身絕非無足輕重。思想既反映又構成這些社會關係的有效組成部分,可為推翻這些關係的鬥爭作出貢獻。

這是馬克思多部著作的立論起點。在這些著作中,他通過對最核心、最具現實意義的理論表現形式展開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批判,分析並闡發了關於具體社會物質關係及其內在矛盾的理論;譬如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借助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Philosophy of Law*)批判現代國家,又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依托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批判資本。[3]在這些文本中,馬克思通過對國家與資本核心理論論述的內在批判,構建了其關於國家與資本的理論體系。具體而言,他首先梳理出當代社會關係中最關鍵的論述,通過剖析這些論述的理論矛盾及其所反映的社會與物質矛盾,進而構建出替代性的理論框架。正因如此,馬克思的著作成為理解思想與歷史語境關係的典範,這種將思想置於歷史背景中解讀的路徑,自 20 世紀 60 年代末以來始終是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命題。

然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該學科中的影響相對有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無疑在於昆廷·斯金納在其劃時代的論文《思想史中的意義與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中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論戰性批判,這篇論文成為『劍橋學派的某種宣言』,並對整個學科產生了決定性影響。[4]

三、斯金納的觀念史語境化

斯金納在《思想史中的意義與理解》中提出,歷史文本及其他來源中表達的思想構成了言語行為,必須結合其形成和介入的具體語境來理解。用斯金納的話說,必須識別這些思想所回應的歷史問題。[5]他通過批判兩種其他方法來構建這一思想史研究路徑:一方面,他批評了所謂『哲學方法』將歷史文本僅僅視為試圖回答所謂永恒問題的嘗試,將其視為持續且跨歷史對話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更符合我們當前研究目的的是,斯金納也對所謂社會學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他指出,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這些方法將政治文本和思想簡化為潛在社會力量的衍生效應,既忽視了作者的創作意圖,也忽略了思想本身的政治意義。[6]

[1] 譯者注:馬克思(著),中央編譯局(譯)。《資本論》(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頁 118。

[2] 譯者注:馬克思(著),中央編譯局(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頁 5。

[3] 譯者注: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頁 3-26。

[4] Gordon, P. (2014). "Contextualism and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Rethinking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 D. McMahon and S. Moyn, 32-5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Li, H. & Q. Skinner. (2016). "Ideas in Context: Conversation with Quentin Skinner." *Chicago Journal of History*, no. 7, 119-27.

對思想史研究的替代性方法總結如下：

在研究任何特定文本時，我們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作者在為特定受眾寫作時，實際意圖通過該文本傳達的內容是什麼。因此，理解文本本身的核心目標，必須是還原作者複雜的創作的意圖。由此可以得出，思想史研究的恰當方法論首先必須界定在特定場合下，通過特定話語可能實現的全部交流範圍，其次必須追溯特定話語與這一更廣泛語言語境之間的關係，以此作為解讀特定作者實際意圖的手段。

通過歷史研究和語言及論辯語境的重建來恢復，這些語境是基於主導的先入之見、慣例、假設、語言以及作者和其他重要行為者之間的當代辯論而構想的，這些行為者框定了文本並形成了文本。

斯金納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這種語境必然對其產生塑造作用。作者需要在特定語境中使論點具有可理解性與正當性，因此即便試圖改變既定觀念，仍需依賴那些定義該語境的諸多先入之見、慣例與規範。正因如此，即便是激進分子與革命者也『不得不退後一步重新投入戰鬥』。^[1] 政治思想史中最具原創性、激進性或革命性的貢獻，唯有結合其特定歷史語境的慣例才能被理解（這也是唯一能將其認定為原創、激進或革命性的途徑）。在《現代政治理論基礎》（*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導論中，闡述了這一方法的前景與宗旨：

這種研究方法究竟讓我們對經典文本有了哪些新的認知？答案可以概括為：它幫助我們理解作者創作時的意圖。我們不僅能看清文本中的論點，更能洞察作者試圖解答的核心問題，以及他們對當時政治辯論主流假設的接受程度，是認同支持、質疑否定，還是刻意回避。如果只盯著文本本身，我們很難達到這種深度理解。要將文本視為特定問題的答案，必須了解其誕生的社會背景；要準確把握論點的脈絡與力度，就需要掌握那個時代的政治話語體系。

對政治理論經典文本的解讀與理解，本質上需要基於歷史研究，深入理解其思想語境、語言環境、時代政治詞匯及其當代應用。唯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真正把握這些文本作者的創作意圖，從而領悟其深層含義。

四、政治理論的社會史

伍德以馬克思思想為靈感，提出了政治理論社會史的理論框架，以此挑戰斯金納的理論體系。她批評斯金納將歷史文本的語境簡化為其他文本：『看來，歷史語境就是語言、話語、詞匯，而詞語被使用的社會物質條件卻被刻意排除在外』。^[2] 這一批判為她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她將歷史語境擴展至文本之外，特別強調社會政治背景作為理解歷史文本意義的必要前提。要理解政治理論家的論述，必須明確他們試圖解答的問題，並非單純的哲學抽象，而是由特定歷史條件、具體實踐活動、社會關係、緊迫議題、不滿與衝突等現實情境所提出的現實問題。^[3] 換言之，對政治思想史的語境化解讀，不應僅僅導致一種更全面的思想史，就像斯金納最初批評的哲學方法一樣，最終將政治理論從它所介入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中抽象出來。

因此，伍德對政治理論的社會史研究可以說是在超越斯金納和劍橋學派最初研究範圍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歷史語境化，並對其隱含的學術與文本偏見進行了修正。伍德堅持認為，政治理論的經典文本應當結合其所介入和回應的社會政治背景進行解讀。哪些階級在崛起，哪些在衰落？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的滲透程度如何？政府體制與統治體系中，階級結構的映射是否到位？社會中的宗教與民族分化如何影響政治

[1] Skinner, Q. (2002). "Moral Principles and Social Change." In *On Method. Vol 1. of Visions of Politics*, 145-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Wood, E. M. (2008). *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London: Verso.

[3] Wood, E. M. (1995).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Renew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經濟生活？社會行為的規範模式有哪些？最後，我們還需評估各類思想潮流與學派的政治理論的社會史必須重新詮釋關於其社會背景的歷史文本，這需要特別關注最核心政治結構的發展、主導的社會財產關係、階級結構以及其他社會身份、等級和衝突以及語言和意識形態背景，同時又不能被簡化為其中任何一種。這對西方政治思想史令人印象深刻的起點，政治思想史必須從雙重意義上理解，既包含政治思想史本身，也包含對其內容作為政治幹預在諸多不同社會和政治背景中的重讀。^[1]

五、政治理論社會史的矛盾與可能性

儘管艾倫·梅克辛斯·伍德的理論起點是馬克思，但她的政治理論社會史研究始終未能觸及馬克思。這並不奇怪，因為兩卷本著作已涵蓋從古希臘到近代早期的漫長時期。作為對比，昆廷·斯金納的兩卷本《思想基礎》(Foundations)也涵蓋了十三至十六世紀的歷史。^[2]然而這種遺漏背後蘊含著更深層的考量：在方法論層面，這種思想史研究路徑會限制歷史文本與其原始歷史語境的關聯性，因此馬克思始終是政治理論社會史研究中的盲點。若基於這些方法論依據解讀馬克思，將動搖其相關性正是伍德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基礎，因此必須保持未被言明的狀態。這種歷史主義的必然性源自斯金納對思想史的處理方式，而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理論社會史的內在矛盾既繼承自前者，也可能通過後者得到化解。不過在探討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如何解決這些矛盾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更詳細地勾勒出這些矛盾的輪廓。

歷史主義要求我們能夠且應當避免將歷史文本與當下進行同化，這一要求具有內在矛盾性。因為所有試圖在當下理解歷史文本或理論的嘗試，本質上都是對其原始語境的抽象化處理，旨在讓當代讀者理解其歷史意義。正如皮埃爾·布迪厄和羅傑·夏蒂埃所指出的：『一本書之所以改變，恰恰在於它不會隨世界變遷而改變』。^[3] 儘管對思想與社會背景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特定歷史文本，但這種研究的必要性恰恰印證了當代讀者與歷史文本之間的歷史隔閡。從定義上說，當代讀者在解讀歷史文本時，始終以當下視角來詮釋歷史。愛德華·哈萊特·卡爾精辟地總結了歷史主義的內在矛盾：『我們只能通過當下的視角來觀察過去，才能真正理解歷史』。^[4]

此外，這種解讀必然涉及對歷史文本及其背景中特定部分的刻意選擇、組織與闡釋；要構建出連貫的文本解讀，其深度不可簡化為對文本或背景的簡單陳述。歷史文本的解讀始終以當代關切為導向，既要闡釋歷史分歧與斷裂以使論點對當代讀者清晰易懂，又要回應文本可能揭示的當代政治議題，或反之亦然。這種解讀本質上是將歷史文本從一個語境轉換到另一個語境，這一過程既會直面文本本身的局限與可能性，又可能突破這些限制。它既可能停留在單純注釋層面，也可能超越注釋，最終不僅為政治思想史作出獨特貢獻，更作為對社會政治語境的幹預而具有獨立價值。

通過揭示當代主流思想偶然的歷史性崛起，從而動搖其主導地位的政治理論。然而，瑪格麗特·萊斯利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種研究方式將思想史簡化為一種死亡提醒，其唯一意義在於提醒我們文化並非永恆。^[5] 這或許有些誇張，但她正確地指出，這種觀點將政治理論史的當代意義局限在基礎而長期的負面或批判功能上，即侵蝕主流思想，同時否認了這些思想以及相對次要的思想可能對理解或幹預當下具有積極

[1] Wood, N. (1978). "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6(3), 345-67.

[2] Wood, E. M. (2008). *Citizens to Lord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Antiquity to the Middle Ages*. London: Verso.

[3] Chartier, R., trans. Lydia Cochrane. (1994).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 Carr, E. H. (1990).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enguin.

[5] Leslie, M. (1970). "In Defense of Anachronism." *Political Studies*, 18(4), 433-47.



貢獻的可能性。這一主張頗為奇怪,尤其對於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艾倫·梅克辛斯·伍德而言,他在其他地方堅持馬克思思想的持久相關性,其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內在對主導思想批判的生成能力,正如我之前概述的那樣。

伍德與斯金納關於思想史間接當代相關性的論述,隱含揭示了他們似乎未曾考慮的兩個關鍵點:首先,曆史思想即便脫離其原始曆史語境,仍能保持相關性並獲得決定性重要性,因此我們沒有充分理由將對這些思想及其意義的理解局限於原始曆史語境。其次,曆史思想的研究本身如同其研究對象一樣,必須被理解為對其曆史語境甚至可能超越的一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政治幹預。只要這種研究能在新的曆史語境中再現、發展或挑戰特定政治思想,就構成了伍德與斯金納所缺失的方法論自我反思。在思想史研究中強調反思性,並非旨在暗示自傳式誇張的必要性,甚至也不一定需要對當代社會政治背景進行深入分析。其唯一目的,是凸顯潛在的當代性。當今社會與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意義,其價值不容忽視。相反,我們必須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時,以反思性的方式將其納入考量。

六、唯物主義思想史研究綱要

要對思想史採取唯物主義方法,就必須突破伍德和斯金納曆史主義的矛盾,轉而採用一種解釋性方法來研究政治思想史。這種方法既要承認政治思想作為曆史組成部分的地位,又能反思性地處理其在曆史語境中的政治介入。在此框架下,曆史唯物主義既能作為範式又能充當指南,它公開承認自身具有規範性的政治立場,同時仍致力於對其研究對象進行嚴謹的曆史分析。事實上,這兩種方法在這一傳統中本就密不可分,這恰恰說明:我們既無法置身於主導社會關係之外,也無法對其保持中立,畢竟我們自身及其思想都深深植根於這些社會關係之中。因此,它需要一種明確且具有自我反思性的政治定位。這種明確的政治定位既不會挑戰也不會削弱準確進行社會與曆史分析的能力。相反,它對這種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這些分析旨在支持並幫助指導當代政治鬥爭。

馬克思本人正是通過內在於主導思想的批判來實現這一目標。這種批判方式刻意深入文本本身,將其視為特定曆史語境的表達與組成部分,從而揭示其內在局限性,並直面文本可能反映和延續的社會與物質矛盾。這種獨特的批判方法,既從文本作為社會物質語境的表達與組成部分出發,又深入探究其內在矛盾。這些固有矛盾構成了對文本對象的新理論闡釋基礎,為當代政治鬥爭提供了方向指引。此外,我們還可回歸特定曆史思想家,運用相同的方法論工具,重新詮釋並恢復那些對當代分析與政治目的具有相關性的特定理論資源。

若能以重新構想的唯物主義方法來審視思想史,並以此方式把握其政治意義,便能持續闡釋並深化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根基,這與伍德對政治理論的社會史研究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思想史研究方法可以將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洞見,即思想既是特定社會中心性社會物質關係及其矛盾的反映,又是其有效組成部分,這些關係支配著社會成員生存狀態的再生產與伍德政治理論社會史的方法論主張相結合。具體而言,這需要系統地將曆史文本和思想置於主導性思想與論爭的語境中進行考察,同時深入分析最具核心性的政治結構、主導性社會財產關係、階級結構及其與其他社會身份、等級制度、沖突矛盾的關聯,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其起源特征。

然而,伍德所繼承的曆史主義必須被摒棄,轉而採用一種唯物主義方法,這種方法明確承認其雙重屬性:既試圖理解過去,又試圖幹預當下。由此,它既保留了原始文本的規範性與政治性維度,也保留在政治思想史中與這些文本後續互動的特征。唯物主義並非對思想史持中立態度,而是一種積極介入的思想史與思想現狀的實踐路徑,它主動且反思性地參與並試圖改變自身存在的環境與條件。



這種新穎的唯物主義方法可以以多種方式介入思想史研究,下文我將重點闡述其中最具意義的兩種路徑。首先,這種方法可用於對特定社會中核心社會關係與物質關係及其矛盾的重要理論表述進行內在批判,從而更深入理解這些文本及其反映的歷史背景,並將其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形成有效關聯。這不僅能深化對文本的理解,還能揭示文本所參與並反映的社會關係,既涵蓋過去也涵蓋當下。通過這種方式,對核心歷史文本的內在批判與語境化處理,既發揮著批判功能,又具有生成作用,既挑戰主流觀念,又構建出關於核心社會物質關係及其所反映與參與的矛盾的新理論框架。其次,這種新穎的唯物主義思想史研究路徑,不僅能從馬克思著作中追溯並發展其理論淵源,更能突破這一起源,重新發掘過往思想家的批判性概念與分析資源,這些資源可被重新運用以理解並介入當下語境。

儘管馬克思主義對思想史的初始研究形式在經典著作中已確立,最典型的當屬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內在批判,但第二種研究路徑則相對少見。為此,我將通過三個相互關聯卻各具特色的史實案例,深入探討並闡釋這種政治思想史研究方式,旨在重構或拓展當代政治議題的理論框架。以尼科洛·馬基雅維利,被普遍視為現代政治理論傳統的奠基人。理論與觀點將生動展現馬克思主義如何通過借鑒歷史先賢的智慧,推動當代政治思潮的創新發展。馬基雅維利在 1513 年致弗朗切斯科·維托裏的信中宣布《君主論》(*Theses on Feuerbach*)已接近完成。他描述道:每當結束漫長的一天,他都會穿上最華美的衣裳進入書房,翻開古典作家編纂的歷史典籍,仿佛被帶入古代宮廷。他明確表示並非閑談,而是從這些經驗中提煉並發展出實用智慧:『我記錄下從對話中獲得的啟發,撰寫了一部簡短的研究著作《君主論》,盡可能深入探討這一主題的內涵,討論君主制的定義、類型、獲取方式、維持方法及喪失原因』。^[1] 這部著名的《君主論》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完全一致,後者被構建成洛倫佐·德·美第奇在君主這一鏡像中獲取並維持政治權力的指南。在這段文字中,強調了研究和反思歷史的直接當代政治相關性,君主必須閱讀歷史,並在其中考慮優秀人物的作為。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像一些傑出人物所做的那樣,選擇模仿那些在他們之前受到贊揚和尊敬的人。

馬基雅維利關於如何獲取與維系權力的歷史性反思,後來成為眾多重要政治思想家的靈感源泉,其影響鏈條與他上述引述中勾勒的路徑如出一轍。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當屬安東尼奧·葛蘭西,他在墨索裏尼法西斯政權統治下被監禁期間,葛蘭西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撰寫了一系列筆記,該書原定命名為《現代君主》(*The Modern Prince*)。在此過程中,他肩負著雙重使命:既要解讀馬基雅維利的古典著作,又要從中提煉出適用於當代西歐共產黨執政者獲取和維持權力的實用政治智慧。在解讀《君主論》時,葛蘭西特別強調貝內德托·克羅齊的觀點,雖然馬基雅維利最初是為洛倫佐·德·美第奇撰寫此書,但其最終出版後,這些政治洞見便向公眾開放,因此保持了政治中立性。葛蘭西承認這種中立性在理論上成立,但他堅持認為:『馬基雅維利本人曾明確指出,他所論述的內容正是歷史上最偉大人物始終踐行的實踐之道。』因此,他的著作顯然並非為那些已掌握內情的人而寫。這正是葛蘭西試圖通過實踐哲學重申的主張,即『發展一套適用於未掌握實權陣營的政治理論與實踐方法,因為歷史進步力量正蘊藏於這些群體之中』。^[2] 葛蘭西基於對馬基雅維利及其他重要思想家的研讀所構建的實踐哲學,著重探討如何將底層民眾凝聚成具有歷史進程的聯盟,從而實現文化與政治霸權,具體細節在此暫不贅述。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路易·阿爾都塞,他對馬基雅維利的興趣是通過葛蘭西的筆記中介的,而他對《君主論》的思考將在其偶然唯物主義的發展中發揮核心作用。^[3] 阿爾都塞將馬基雅維

[1] Machiavelli, N., trans. J. Atkinson and D. Sices. (1996). "Niccoló Machiavelli to Francesco Vettori. Florence, 10. December 1513." In *Machiavelli and His Friends: Their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262-265.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 Gramsci, A., Trans. Q. Hoare and G. Nowell-Smith. (2005). "The Modern Prince."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123-205.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3] del Lucchese, F. (2010). "On the Emptiness of an Encounter: Althusser's Reading of Machiavelli." *Décalages* 1(1), 1-19.

利視為先前未被認可的地下哲學傳統中的核心人物，他將這一傳統描述為偶然唯物主義，包括巴魯赫·斯賓諾莎、托馬斯·霍布斯、雅克·盧梭、馬克思等思想家。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不同，後者據稱源自第二國際，該學派並未依賴於歷史目的論的隱晦唯心主義。相反，它對歷史的偶然性或隨機性保持開放態度，因此特別適合思考當代背景下革命政治實踐與革命的可能性。^[1] 阿爾都塞指出，馬基雅維利對這一傳統思想體系的原創性貢獻，他刻意在於認識到所有政治秩序本質上都具有偶然性起源和潛在不穩定性。這種認知使他能夠從政治實踐可能引發變革的視角進行研究，即採用一種反對決定論和目的論的革命性視角。正如他在一次訪談中所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接近提出過關於歷史的理論，即那種不可預見、獨特且隨機的歷史事件；唯一真正思考過當下政治歷史與政治實踐理論的人，正是馬基雅維利。這個理論鴻溝亟待填補』。^[2]

這三個案例的核心價值在於闡釋唯物主義視角下對思想史的重新解讀：通過在全新語境中重讀歷史文本並賦予其新意，同時汲取其原始歷史語境與深層意涵。正如阿爾都塞在其他著作中所言：『所謂無害閱讀純屬虛構』。^[3] 這絕非意味著我們可以對歷史文本的解讀完全推卸責任，任由其受制於當下歷史語境與政治訴求。關鍵在於確保我們對這些文本的參與和使用具有透明度、連貫性和反思性，使其成為我們當下生活的一部分。

七、結論

本論文旨在構建一種能夠超越當代歷史主義矛盾的唯物主義思想史研究路徑。開篇系統梳理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觀點，強調其將思想既視為當代社會物質關係的映射，又作為其有效組成部分，同時揭示思想與社會關係內在矛盾的辯證關係。儘管這種研究方法對思想史的語境分析具有重要價值，但歷史唯物主義在學術界始終處於邊緣地位。筆者認為這種邊緣化現象可追溯至斯金納 1969 年發表的標志性論文《思想史中的意義與理解》，該文批判馬克思主義將思想簡單等同於社會力量的外在表現，從而削弱了思想的政治意義。文中還詳細闡述了斯金納極具影響力的語境分析理論，以及伍德提出的構建馬克思主義思想史新範式的創新嘗試。然而，斯金納對伍德研究方法的潛移默化影響，使得政治思想被系統性地還原至歷史語境，導致無法解釋自己理論源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此外，本文揭示了斯金納與伍德共享的歷史主義立場，他們難以反思性審視自身研究的政治維度。最後，論證了這種重構的歷史唯物主義如何突破歷史主義的局限與矛盾，將思想視為當代社會與物質關係的映射與有效組成部分進行分析，同時承認並反思性地處理其作為歷史進程一部分的地位，將其視為對自身歷史語境的自覺政治介入。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

[1] Althusser, L., Trans. G. M. Goshgarian. (2006).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 1978–1987*. London: Verso.

[2] Althusser, L., Trans. G. Elliot. (1999). *Machiavelli and Us*. London: Verso.

[3] Althusser, L., Trans. B. Brewster. (2005). *For Marx*. London: Verso.